**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书报告**

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程觉晓（2023302181150）

文明弦歌不辍，文脉绵延不绝。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由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撰写的一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专著。它不仅使读者借考古文物得以一窥古中国之图景，更如一扇铜镜，映出了更为深刻、博大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思考。尤其是书中以“三部曲与三模式”与“双接轨”向我们展现了政治与军事的历史变迁，更是生动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多元，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两次历史转折，两次中西思想的激烈碰撞，交融。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昔日的辉煌在19，20世纪几近湮没，那厚重、苍茫的大地浸满焦炭与鲜血，悲剧与无奈。曾几何时，中国建筑本土的考古研究甚至要以隔岸日本学者为参考。而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本土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史观，西方的实证主义触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疑古思潮，又让众多学者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陷入迷惘。因之，考古学逐渐兴起，人们终于意识到，即使是非文字的材料，也可以以它独有的沉默与我们对话，让我们得以回溯，建构中国早期的历史框架，并逐渐恢复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探索的信心，超越传统“证经补史”的定位，开始以自身的语言参与史实的重建。

通过考古，我们终将采撷大地深处的文化碎片，寻找流淌千年的历史文脉，找到一方文化的根与魂。当一座座散落的一直串珠成链，一个个历史的碎片拼凑成画，文脉得以赓续，民族发展的脉络愈发清晰，文化底色愈加鲜亮。借此机会，我也将探讨几个以往未曾思索过的话题。

1. **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在“学读天书”，苏先生便直言：“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实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也就是说，科学与艺术其实代表了理性与感性两种不同的世界认知方式。科学依赖逻辑、证据和实验来揭示客观事实，而艺术则通过直觉、感受和创造来表达主观体验。考古学作为一门旨在解读过去文化的学科，既需要科学方法来确保其研究的严谨性，也需要艺术感觉来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和情感。古代文物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历史情感和社会生活的载体，通过艺术化的感知，考古学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还原古人的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这种融合并非孤立现象。由此，我不禁联想到康德的“物自体”，也即事物本身的真实状态，与“现象”，也即人类感知到的事物状态永远只能达到无限接近而不能完美复刻，这正是由于人类的感知始终无法摆脱对于过去生活的主观体验和再现。

为此，曾经的考古学，不再是纯粹传统的正经补史，它融合了近代西方考古学的方法论，开启了在实践中不断更新、不断蜕变的考古之路。

1. **考古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反思**

解悟与顿悟，这是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我们对于自己本土文化的认识与审视，充满了探索的艰辛，而探索带来的事件使我们得来的认识有所积累与飞跃。考古学的方法论发展，实际上是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方式的一次根本革新。这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变革，更是对历史认识论的一次深刻思考。它挑战了传统的、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范式，提出了一种更为广阔、多元的历史视野。在这一视野中，历史不再是一段段固定的叙述，而是一个充满变化和多样性的过程，需要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多种视角去认识和理解。而事实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和理性的过滤。而考古学，通过挖掘和分析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在尝试突破这些限制，以更接近“物自体”的方式去接触和理解过去，化身为对“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样宏大叙事的一种回应。

由此，在考古学界，我们逐渐认识到，实践和实证研究揭示了现代问题引发的思索与探求。自20世纪以来，面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局势，“接轨”与“赶超”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心态，而中国考古学已经在摆脱这种心态的束缚，转向“求真”。于是，在这一转型的浪潮中，中国考古学不仅仅是对古老文明的挖掘和研究，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自我寻根和自我认识的过程。通过对土地深层的探索，我们不仅重新发现了被遗忘的历史，也重塑了对于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认同。这种对文化根源的深刻反思和探寻，促进了社会对于传统价值的重新评估和尊重，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到了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21新世纪，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在探索人类过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与现代科技和理论进行对话。随着遥感技术、GIS系统等现代技术的应用，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和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些技术和方法的融合不仅提高了考古发掘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使得考古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探讨社会结构、人类行为和环境变迁等问题，从而为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立体的视角。

1. **三部曲与三模式**

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大多经历过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是理念自我实现的过程。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三部曲与三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变迁，更是文化理念与社会精神的展现。在这一过程中，各支祖先不仅展现了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和改造，更体现了对理想国家形态的追求与实践。而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演进，尤其是其与中原文明的互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独特视角。这种跨文化的互动，反映了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野蛮人的思维”并非孤立，而是与“文明”中心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草原民族的崛起，不仅挑战了中原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的问题。

1. **双接轨**

我们的文化一向讲求兼收并蓄，而苏先生提出的“双接轨”正是中西合璧的一种美好构思。它同样启示我们考古学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应该与现代化进程接轨。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中国考古学面临的“双接轨”挑战，不仅是一场学术上的对话与整合，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自省与全球视野下的自我定位。这一过程涉及的不仅仅是如何让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更关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和发展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以及如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找到新的平衡。

面对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们不禁反思，真正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或者盲目追随西方模式。事实上，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转折点教会我们，真正的现代化应当是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考古学作为一门揭示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学科，其独特价值在于能够通过对过去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为今天乃至未来提供灵感和指引。中国古老的工艺技术、农业智慧、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为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之道。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代考古学的发展提醒我们，任何文明的繁荣都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往往因为忽视了与自然的平衡而走向衰落。因此，在探索古代文明的同时，考古学更使我们意识到，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现代问题，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对古代社会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引我们在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尾声**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五千年文明从来不缺乏精彩故事，只是缺少融入时代语境的表达方式和途径。无论是三星堆考古现场的全景式直播，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线上文创，还是此前收获无数点赞的《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唐宫夜宴》等节目，都是对表达方式和途径的有益探索，希望考古学在今天这个时代焕发光彩，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古老的种子，它生命的胚芽蕴藏于内部，只是需要在新时代的土壤里播种。千年的风悠悠荡荡，有些遗响沦失于古老的肃穆。携上行囊，赴一趟追寻古迹的苦旅，或许是那大漠飞沙的敦煌，几近绮丽的故宫，千年一瞬的莫高窟，那些神秘与安详，华美与矜持，铺陈的史迹终将跃动着，起伏着，淌入心底。就让我们追寻中华文化的真实步履落在敦煌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吞吐千年。